

中法闪电建交内幕

戴高乐将军于 1959 年 1 月再主爱丽舍宫后，推行戴高乐主义，与美国相抗衡。20 世纪 60 年代，中法的角色类似：一个是在全球范围向美国霸权挑战的不驯服的盟国；一个是不听从指挥棒直至公开脱离苏联轨道的“大家庭成员”。这正是促成中法建交的基本因素。可以说独立自主是中法之间基本共同点，也是中法建交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当时中法没有外交关系，中国驻瑞士使馆承担了某种对外外交功能。

事实上，两国驻瑞士使馆的工作人员已互相试探了。一份解密文档显示：1963 年 3 月 30 日，王进参赞拜访法驻瑞参赞高桑。王引用戴高乐的话说，“法国有自己的人格”，中法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现在中国也是个大国，也不容别国歧视。王进话中的两个“也”字，别具意味。

高桑说：“战后，法国重建了自己的经济。法并非反美，而是认为自己可有所作为。因此，报纸上将肯尼迪面前的戴高乐比作赫鲁晓夫面前的毛泽东。”

法方同样利用第三国的外交舞台寻求与中国的接触。一份 1963 年 8 月 1 日的报告显示，来自中国驻柬埔寨商务参赞 Calzarone 私下

对中国外交官表示：“法国和中国不久后可能建立邦交了。几年来法国一直在研究中国，认为同中国交往比同英美苏等国要好得多。法国是大国还受人欺负。英国同法国是世仇，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欧洲国家都怕它，美国就更别提了。他们害怕欧洲的法国和亚洲的中国，签订禁核条约就是为了限制中法两国的。”求同之心，溢于言表。

很快，在一份等级同样为“加急”的解密文件中，中国驻瑞使馆提出了“关于加强同法国政界人士接触并相机邀其访华”的建议。其中主要的候选人为富尔、密歇勒和加比唐三人，其中富尔便是后来起到和基辛格同等重要作用的法国密使。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与中国建交的问题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正在瑞士达沃斯休假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去伯尔尼会见我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要求再次访华。他表示，此行纯系私人性质。

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外交部很快复电同意，有趣的是，复电中谈到：“关于费用问题，争取来往旅费由他自己负担，在华期间（食宿、交通）等费用由我负担，如富尔主动要求我负担全部费用，亦可同意。”

延安初识毛泽东

1937 年，陈伯达带着妻儿，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那是一次由毛泽东参加的理论座谈会,讨论孙中山的思想。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

毛泽东仔细倾听双方争论。就在争论愈发激烈的时候,陈伯达发言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加以阐述。他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含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陈伯达发言完毕，毛泽东站了起来，很高兴地说:“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散会之后,毛泽东把陈伯达留下来,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当天傍晚，毛泽东派人通知陈伯达，要他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吃晚饭。陈伯达急急忙忙地赶去,到了那里才明白，毛泽东宴请了一位美国记者，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今天顺便也请你,请你和美国客人。”这次请客很简单,毛泽东、翻译、美国

记者、陈伯达 4 人同桌而餐。起初,毛泽东跟美国客人说了一些客套话。后来,他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先秦诸子课，而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也饶有兴趣。这样,他们之间便有了共同的话题，越谈越投机,竟把美国客人摞在一边。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人生的转折点。

与毛泽东讨论古代哲学

被毛泽东看中之后，陈伯达不再坐冷板凳了。经毛泽东提议,陈伯达在延安举办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每一次讲座,毛泽东差不多都去听。毛泽东一去,许多人也跟着去。虽然陈伯达的话难懂,听久了,也慢慢听惯了。很快,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有了名声。1938 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学会”,陈伯达成了这个学术团体的领头人,执笔写了《新哲学会缘起》，发表于 1938 年 9 月《解放》周刊。1939 年 1 月,陈伯达写出《墨子哲学思想》一文，恭恭敬敬面呈毛泽东,请求毛给予指正。毛泽东很细致地读完《墨子哲学思想》，亲笔给陈伯达复了一封信：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觉,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毛泽东的书信很短,但《墨子哲学思想》引起了极大兴趣。虽然复了信,他仍觉得意犹未尽,便又写了好几页纸的意见附在信后。陈伯达所擅长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正是毛泽东当时思索的热点。陈伯达见毛泽东对他的文章如此看重，于是又向毛泽东呈上他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和《老子的哲学思想》两篇文稿。毛泽东读后，兴致很浓，于 1939 年 2 月 20 日写了一封更长的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详细地写了 7 点意见，针对陈伯达的文章，谈了自己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看法。陈伯达收信后，当即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再呈毛泽东。

1939 年 2 月 22 日，毛泽东又写一封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伯达同志的文章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伯达同志考虑。……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又补充了 3 点意见。

一步步爬上高层

借助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探

这一带。他们的重武器对运输产生了很大的干扰。霍英东回忆道：“我率领的船队，有一条叫黑猫号的船，被国民党方面的船只撞沉了。而撞船的肇事者，公然把被撞沉的黑猫号推上了法庭。港英当局就想以走私非法运输的罪名，将我置于死地。但最后判决还是合法的，因为黑猫号被抓住还是在香港的领域，到了法庭最后罚了不到 200 块钱，理由是夜间航行没有开灯。”

由于运送禁运物资的次数太多，霍英东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注意。黑猫号法庭上没让港英当局得手，但是一场长达几十年的政治迫害、政治打压接踵而来。

霍英东说：“法庭判决我们是

夏·戴高乐
 由于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中国领导人写信。形式上信是写给富尔本人的，实际上却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

10 月 22 日，既不是政府成员，也没有正式外交头衔的富尔夫妇没有住原定的北京饭店，却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一系列外交上的高礼遇是有内涵的，富尔不会不清楚。富尔访华后，和中方智慧地解决了“台湾问题”，并最终建立了外交关系。

如同当时全球震惊的舆论那样，这不啻是新中国的一颗外交原子弹。

法国的决定受到其他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指责。但法国政府仍坚持它的决定。戴高乐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地对其盟友说，“时间会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1964 年中法建交后不久，在美国政坛上失意的尼克松来到巴黎。戴高乐在会见这位美国前副总统时，反复解释了法国与中国建交的理由。他对尼克松说：“我无意干预美国的政策，但我认为，美国应当考虑承认中国。”他还说：“中国还不强大，现在就承认中国，比等到中国强大起来，你们被迫承认她要好。”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尼克松后来主导的中美建交历程与中法建交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

(摘自《悦读》)

讨，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泽东请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1939 年，毛泽东提名，调陈伯达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

陈伯达调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而当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因此陈伯达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办公室副秘书长。

毛泽东给陈伯达拟定了 4 项任务，即 4 个研究课题：《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陈伯达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陈伯达说，是毛泽东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从此陈伯达便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成为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不久的陈伯达出任秘书长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后来，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陈伯达被任命为主任。虽然职务在不断变动，但陈伯达一直没有脱离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一最重要的职务。倚仗毛泽东的信任，陈伯达很快进入中共高层，尽管他的职务并不很高，但他所处岗位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陈伯达以后能够飞黄腾达,起点便是毛泽东秘书这一职务。

(摘自《党史博览》)

合法的，当局只好在我投资房地产时打压我，原来我们投标了一块居于中心位置的地皮。但是我中标以后，港英当局不信任我。像我建星光行那个 20 层的大厦，被规定所有在里面办公的住客不能买美国的东西。当时我感觉完全没有道理，美国人怎么可以干预香港内政。不买美国货也是没有问题的，很多住客愿意租。但是最要命的是港英当局不给安装电话，最后整个大厦只得以一个非常低的价钱转让给了英国人。”

一时间，在香港还传出了一种谣言:霍英东因走私，要被递解出境了。在这种情况下，霍英东卖楼花被逼上了十分困难的境地。不仅如此，小肚鸡肠的西方在港势力长期不许霍英东进入香港主流社会。对此，霍英东嗤之以鼻。

(摘自《扬子晚报》)

“江姐”这一称谓是怎样叫出来的

说起小说《红岩》,人们首先会想起大义凛然的江姐。江姐原名江竹筠,那么“江姐”这一称谓是怎样叫出来的呢?

现实中江竹筠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她在万县地方法院会计室当职员。5 个月前,她的丈夫、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在组织武装起义时壮烈牺牲。组织本想将她调回重庆工作,她拒绝了,继续留下来担任联络员。

1948 年 6 月 14 日早晨，江竹筠走在路上,忽然听到有人喊她。回头一看，原来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当时,重庆许多党员被捕的风声已经传到下川东地区。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地说:“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来……”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江竹筠更觉不对,按照地下工作纪律,公开场合不能提及领导人的真实姓名。她不再理睬,径直朝前走。冉益智急了,跑上前来拦住去路,两名特务也冲了过来。

江竹筠押回重庆后关进了渣滓洞，刚入狱时,难友们都叫她“竹筠”。当特务提审她时,大家很关注,也很不放心。因为她掌握着许多线索，大家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酷刑。一天早上,特务把她拉到刑讯室里,用编成一排的竹筷子夹手指,想撬开她的嘴,疼得她晕过去 3 次。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她架回牢房。难友们纷纷隔着签字门向外张望,发现她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

当时,也不知道是谁,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改口喊“江姐”。
 (摘自《重庆晚报》)

“摆架子”由来

“摆架子”一词源于我国古代民间的一项游戏,后传到日本成为体育项目“相扑”。相扑比赛是在两位体重各达几百公斤的大胖子之间进行,比赛开始时,两个大胖子光着上身,叉开双脚,弯着腰昂着头,彼此虎视眈眈。因为相扑运动员摆架势吓人，我国古书中就借它来比喻装腔作势摆架势显威风的人。清朝有位叫顾铁卿的学者在他写的《清嘉录》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耍耍诸戏来自四方，各献所长,以娱游客之目……两人裸体相扑,谓之‘摆架子’。”
 (据《文摘周报》)

胡宗南宽待赌棍

胡宗南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在他当师长的时候，手下有一个姓张的团长,性极好赌,每每上赌场都要赌个天昏地暗。有一次，这位张团长去师部领军饷,刚领完钱,就又和几个赌友聚在一起狂赌起来。结果，一下午就把整个团的军饷输了个精光,只好空着手回到团部。

第二天，各营的营长来找他领饷,他推脱说师里没发。但以后几天,每天都有人来问,眼看着再也隐瞒不下去了。他下令把全团官兵都集合起来,准备向他们说明真相。他骑着马,扬着马鞭,站在队伍面前,大声说:“弟兄们,咱们团的军饷领来了!”士兵们一听,都高兴得欢呼起来。

“但是,遗憾得很,我在赌博时把钱都输光了!”全体士兵一听,都傻了眼。“放心吧!弟兄们,我一定要把它再赢过来!”说完，他一扬鞭,飞奔而去,台下士兵顿时哗然。

张团长来到师部，硬着头皮走进了胡宗南的办公室，怯生生地把输钱的事给胡宗南说了。胡南宗一听大怒，上前“啪啪”照脸上就是两巴掌,打得张团长眼里直冒火星,然后又骂一句“狗日的”便走出了办公室。张团长一时不知所措，只好呆呆地站在那里。

谁知胡宗南一走,把这事忘了,天黑了才回来。他看到张团长还站在那里,心中的火气已消了一半，便坐在办公桌前写了一个条子,递给张团长,说:“拿去,再领一个月的,狗日的以后再敢胡来,我非敲你的脑袋不可。”

张团长大喜，接过纸条连声说:“谢谢师座,谢谢师座!”说完,高兴地离去了。
 (摘自《文史月刊》)

霍英东红色“走私”救国难

一提到霍英东在战时的发迹传奇，了解的人会说：“识时务，够胆量，是无情封锁下的有情买卖。”不了解的人会说：“发国难财，资本家的剥削，财路不明。”种种传闻，成了霍英东一生中最有争议，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段历史。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操纵下，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第二年，英国就此禁止 13 类物品从英国或英属地（包括占领的香港）运往中国内地。

这是“国难”。香港素以转口贸易为经济支柱，身处香江之畔的霍英东产生了冲破禁运的大胆想

法。

霍英东说：“当时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要派志愿军抗美援朝，物资非常缺乏，很多东西来自四面八方，但是如何把东西送到内地？当年我还是在海上做运输的，内地需要的东西，从汽油、煤油、柴油到棉花、钢铁、橡胶等，我都会运到澳门（从澳门进入国内）。当然是要在商言商，当时香港也是百业凋零，民不聊生。作为中国人的一分子，我没有在战争中发国难财，因为我们的收益就是一些船租，我们也有不少工人，包括装卸、船员奖金都是靠这些钱。”

抗美援朝期间，国民党的残余退到澳门、珠江三角洲、万山群岛